

智能机器崛起背景下的时空折叠想象与劳动者困境

——从《北京折叠》的海外获奖谈起

林 品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市，100048；harrylinpin@163.com）

摘 要：本文在智能机器崛起的时代背景下，考察科幻小说《北京折叠》的时空想象，将文本分析与社会学批评相结合，指出《北京折叠》之所以能够赢得“雨果奖”，不仅是因为它以空间区隔作为阶层断裂的具象化隐喻，更是因为它时间分配作为失业危机的治理术实验，从而触及了智能机器时代的重要社会问题；相较于经典的反乌托邦作品，郝景芳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的叙事策略，搁置了后人类的科幻元素，给其作品抹上了一层人道主义的温情光晕。

关键词：《北京折叠》；科幻文学；智能机器；劳动

引言

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堪称 21 世纪以来最具话题性的华语科幻文学文本之一。这部诞生于 2012 年 12 月的中篇小说，最初以清华大学学生论坛“水木社区”为首发平台，经美籍华裔作家刘宇昆（Ken Liu）的英译传播，于 2016 年 8 月 21 日荣膺世界科幻协会（World Science Fiction Society）“雨果奖”（Hugo Award）最佳中短篇小说奖。作为继刘慈欣的《三体》之后第二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幻作品，其获奖事件在文学界与科幻爱好者圈层引发了广泛讨论：赞誉者视其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坐标，着重肯定其社会问题意识；批评者则质疑其获奖乃是受益于“西方政治正确”的评判框架。需要指出的是，“雨果奖”作为一个由全球注册会员普选产生的奖项，其归属本质上反映了国际科幻社群通过选票表达的价值认同。无论评价分歧如何，多数论者普遍承认，这部作品以其科幻设定与文学叙事建构起一种关于社会现实的寓言式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折叠》可谓是运用“科幻现实主义”手法^[1,2]，将社会结构性矛盾转化为文学寓言的典型文本。本文试图从小说的时空设定切入，解析其科幻想象与现实观照的互文映射，探讨其如何通过虚构的折叠城市模型，既显影又潜在遮蔽了智能机器崛起时代的劳动者困境。

1. 空间区隔作为阶层断裂的具象化隐喻：《北京折叠》的城市社会学想象

《北京折叠》的核心叙事围绕垃圾处理工老刀的跨空间流动展开：身处“第三空间”的他为筹措养女糖果的幼儿园费用，冒险穿越“第二空间”，受研究生秦天之所托，进入“第一空间”传递信物。这一过程不仅串联起三个空间的物理区隔，更以主人公的视角暴露出不同阶层在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及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异。

这部小说构建了一个高度符号化的折叠城市模型：经过 8000 万建筑工人参与的超大规模改造，北京被划分为三个时空交错的闭合空间——“第一空间”容纳居住着握有权势的统治者群体（及其助理、秘书或相关服务人员），第二空间聚集中产阶层与知识后备军（在校大学生），第三空间则是无产者的聚居地。当某一空间“展开”时，其余空间陷入折叠状态，居民在催眠药剂作用下进入休眠，跨空间流动被严格管控。这种将城市物理切割为互斥区域的设定，实质是当代社会阶层隔离的极端化想象：空间不仅是地理容器，更成为权力分配与资源垄断的物质载体，通过建筑形态的区隔实现阶层关系的固化。

这种空间政治学隐喻并非郝景芳的独创，而是植根于科幻文艺传统中的“垂直都市”母题。在科幻文学史上，这种带有“反乌托邦”色彩的世界观设定模式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欧美科幻作家的未来想象，英国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就曾在工矿业、石油开采业等产业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设想出人类社会向地下延伸、地上与地下彼此区隔的垂直型空间分布。在其影响深远的经典小说《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1895）的世界观设定中，随着阶层差距的扩大与阶层鸿沟的固化，人类演化出“爱洛伊人”和“莫洛克人”两类亚种，前者由资产者、贵族发展而来，占据着地表空间，享受着阳光与闲适；后者则由无产者、底层劳工演化而来，困居于地下世界，终日劳动不息。德国电影艺术家弗里茨·朗（Fritz Lang）也曾在新约曼哈顿天际线所带来的震惊体验的激发下，对现代化大都市的未来前景展开大胆的想法[3]，进而在他所执导的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 1927）中，以表现主义的视觉风格为世人展现了一个由高层建筑、立体交叉交通系统和地下设施所构成的垂直都市。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电影的世界观设定中，上层资产者生活在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立体化交通井然有序的地上都市当中，享受着高科技所加持的奢靡生活；而下层劳动者则行走在暗无天日、机器轰鸣的地下劳工城和地下工厂，用夜以继日的重复操作维持着巨型机器的运转。作为文学领域和电影领域极具开拓性的先驱之作，《时间机器》和《大都会》为后世的科幻创作者提供了一系列可供改写的母题和可资借鉴的意象，其中之一就是阶层区隔的垂直都市、地上/地下的二元空间：地面上的摩天建筑象征着资本权力的云端集聚，地面下的机器世界则成为劳工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囚笼。由此而来的科幻脉络一直绵延至今，就在《北京折叠》发表前后，《时间规划局》（*In Time*, 2011）、《饥饿游戏》系列（*The Hunger Games*, 2012-2015）、《全面回忆》（*Total Recall*, 2012）、《逆世界》（*Upside Down*, 2012）、《极乐空间》（*Elysium*, 2013）等多部一度热映的科幻电影，也都以不尽相同但彼此相通的方式，借助空间区隔的视觉影像来映射阶层断裂的社会问题。

相较而言，《北京折叠》的创新在于将垂直区隔转化为平面折叠，通过城市形态的动态变形强化阶层接触的偶然性与短暂性。然而，这种设定在科幻美学层面并未突破既有框架：与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科幻电影《盗梦空间》（*Inception*, 2010）中巴黎街巷的折叠翻转所带来的视觉震撼，或者《三体》中微观粒子的维度展开所蕴含的科学思辨相比，《北京折叠》的“城市折叠”书写更多停留于社会隐喻层面，缺乏自然科学逻辑支撑的硬核想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部分“硬科幻”拥趸对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北京折叠》仅仅是为传统阶层叙事套上科幻外壳，以中国的象征符号替换西方的都市原型，这种城市社会学想象的突破性和震撼力远远不及《三体》对于宇宙社会学的构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空间区隔的叙事策略虽然有效强化了阶层差异的直观冲击，却也暗含对现实社会流动性的简化处理。现实中的阶层壁垒并非由物理空间直接划定，而是通过教育资源分配、职业准入门槛、文化资本区隔等多重机制构建。小说将复杂的社会结构转化为可折叠的物理空间，固然增强了寓言的明晰性，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阶层固化的系统性成因，使批判停留在空间表象而未深入制度肌理。

2. 时间分配作为失业危机的治理术实验：折叠城市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如果我们暂且搁置“硬科幻/软科幻”的二元区隔[4]，依然“入圈随俗”地袭用那套将“硬科幻/软科幻”当作趁手标签的二元论的分类方式，那么，作为一部的确是以社会科学和现实寓意为重点的“软科幻”作品，《北京折叠》真正彰显思想深度的，在于其以时间分配为枢纽建构的危机治理模型。在小说设定的折叠城市内，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三个空间每四十八小时完成一轮“转换”：“第一空间”（500万人）占据清晨6点到次日6点的24小时，“第二空间”（2500万人）使用次日6点到22点的16小时，“第三空间”（5000万人）仅拥有22点到6点的8小时。这种看似服务于空间隔离的时间配给机制，实则是统治者应对智能机器取代人类劳动所引发的失业危机而展开的“顶层设计”。

这种科幻世界观设定深深植根于郝景芳的经济学训练与政策研究背景。事实上，在中国科幻文学界，除了极少数成名作家之外，绝大多数的科幻小说创作者，都是业余从事科幻写作的跨界者，他们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郝景芳也不例外，她在2013年获得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的课题研究。正是郝景芳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小说中欲言又止、一笔带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稔熟，使其敏锐地观察和捕捉到失业率的社

会经济影响。“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可以用来表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简单地说，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就低；当失业率低时，通货膨胀率就高。过高的失业率会导致货币工资水平和社会消费需求下降，进而造成通货紧缩性经济萧条。这样的问题意识，与方兴未艾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所带来的未来展望相结合，造就了《北京折叠》世界观设定的深层缘由：随着数字化智能装备技术与机器人自动化技术的进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人类劳动者，将很有可能会被效率更高而成本更低的智能机器人所取代，由此而来的失业问题，有可能会造成大量无业可就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无疑将威胁社会经济的增长和社会政治的稳定。

《北京折叠》就像是一场思想实验，为智能机器崛起背景下有可能发生的失业问题提供了一种“治理方案”：通过时间压缩将底层群体的活动限制在夜间，既为其保留垃圾处理这种“必要劳动”（维持城市的“代谢循环”）作为赖以谋生的工作，又通过空间-时间的双重隔离阻断通胀传导链——在“第三空间”与“第二空间”“第一空间”之间，仅存在垃圾实物流动，货币经济体系完全割裂，从而避免底层失业引发的经济危机冲击上层社会。

这种时间分配策略将无产者的生存时间压缩至最低限度，使其劳动力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从而形成永久性的“时间贫困”。第三空间的8小时不仅是生理活动时间，更暗含着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当智能机器承担了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人类劳动者被挤压到机器无法完全替代的边缘领域（如垃圾处理），其劳动时间被异化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这种设定与马克思“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形成互文：资本不再单纯延长劳动时间，而是通过技术进步重构整个社会的时间分配体系，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名义下提高其对无产者的剥削程度。

在阶层固化的空间隐喻之上叠加的失业危机问题，或许才是《北京折叠》的社会寓言可以在西方科幻读者群体里激起较为广泛的共鸣，从而赢得“雨果奖”评选的最多选票的核心创意元素。而这场思想实验之所以能够引发西方读者的共鸣，在于其敏锐地触及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困境：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寻求生产要素的“优化（利润最大化）配置”，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此而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国家和地区，造成欧美国家的产业空洞化和就业紧张。制造业岗位流失与福利制度收缩形成恶性循环，让西方社会的科幻读者能够在其社会情境中切身地感知失业危机的结构性困境，这与小说中“第三空间”的“时间贫困”形成了跨时空的呼应。郝景芳在《北京折叠》里特别提及的“欧洲20世纪末失业率上升”，正是这种在21世纪愈演愈烈的结构性危机的历史预演。

而中国在凭借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与积极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成为“世界工厂”，进而实现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动荡的国际背景下，遭遇对外贸易萎缩、制造业产能过剩、国内劳动力成本上涨等结构性困境。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所引发的减薪裁员潮和跨国资本撤离所引发的失业潮，都让就业问题引发很多人的关注。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而掀起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潮流，虽然在国家政策的鼓励和“互联网+”理念的加持下声势浩大，但其新增的很多就业岗位，如物流服务、外卖服务、互联网服务以及各类涉及非物质劳动的“灵活就业”岗位，相比起传统职业而言，显得更加不稳定、缺保障，并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平台算法的宰制与平台资本的剥削，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题所带来的焦虑感和恐慌感。而能够降低人力成本以提高企业利润的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进一步增加了失业潮冲击劳动者群体的可能性。鉴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岗位在智能机器崛起背景下的缩减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对第三产业的非物质劳动就业岗位的替代效应，假如新技术革命促生的新兴产业无法有效地吸纳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社会就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失业危机。这种状况使得小说的警示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的时候，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就曾提出，自动化会导致大量工作机会流失的问题。维纳深刻地揭示了两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分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省力机器的普及让机械动力取代手工劳动，导致“人手由于和机器竞争而贬值”，大量体力劳动者失去工作；而由控制论引领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所造成的颠覆性影响，则使得“人的贬值”从肢体层面延伸至认知层面，也就是说，现代自动机与计算机技术的普及造成了“人脑的贬值”[5]，这有可能导致大量从事标准化非物质劳动的脑力劳动者面临失业潮的冲击。这种对于技术替代效应的预警，在人工智能时代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现实印证：许多曾经停留在科幻设想中的场景，如今已成为日常景观。

然而，技术进步与失业危机的关联或许并非不可逆转的宿命。20 世纪中叶，以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构建过指向人类解放的理想图景：他们期待自动化技术与社会制度变革形成良性互动，将人类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转而投身于“作为人类机能自由消遣”的创造性活动[6]。这种乐观主义之所以会一度蔚然成风，在某种程度上联系着战后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欧美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推行累进税制等政策，暂时缓解了劳资矛盾，甚至为“库兹涅茨曲线”所描绘的“经济增长带动贫富差距缩小”提供了阶段性和局部性的论据。但随着 20 世纪 60 年代探索“另类现代性”的社会运动遭受挫败，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愿景”也逐渐变得暗淡。特别是在“后冷战时代”到来之后，全球资本主义迅速褪去冷战对峙之时为了应对意识形态挑战而加诸于自身的种种限制，摒弃了福利国家的改良主义框架，明目张胆地回归其制造贫富分化、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常态”轨道。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 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13）中揭示的“资本收益率持续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规律[7]，正是这种回归的理论注脚。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经济红利只能被极少数资产者瓜分，而普罗大众则面临着双重威胁：既有工作岗位遭到智能机器的取代，又因分配失衡而难以平等地共享技术进步的成果。

在这种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下，数字化与自动化的技术变革很有可能演变为加剧社会分化的催化剂。随着智能机器逐步取代人类在制造业、服务业甚至知识生产领域的劳动，随着智能系统以更高的效率接管传统上依赖人类认知能力的工作领域，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失业危机已然从科幻叙事走进社会现实。可以说，维纳所预言的“人脑贬值”，在当今时代呈现出尤为复杂的形态：它不仅是技术替代的结果，更是资本权力与技术逻辑合谋的产物。这种强势合谋所造就的“人脑贬值”，将当代劳动者推向了深刻的时间困境，正如《北京折叠》中“第三空间”的垃圾处理工被社会系统压缩至边缘时间从事重复性劳动，现实世界的劳动者正面临着相似的困境：智能机器的高效生产并未带来普遍的闲暇解放，反而加剧了“数字鸿沟”与“技能断层”，使更多人被抛入“技术性失业”或“不稳定就业”的漩涡。

3. 科幻叙事的克制与后人类元素的搁置：《北京折叠》的人道主义光晕

郝景芳对“第三空间”失业危机与时间分配机制的关联性建构，无疑是《北京折叠》最具思想锋芒的部分。她将“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逻辑转化为科幻设定，使得宏观经济学问题获得了具象的时空形态。

然而，如果我们从科幻美学与设定自治性的维度审视《北京折叠》，那么，这部小说对于“第一空间”与“第二空间”的科技图景描绘却显得相当保守。在这个建筑机械可折叠都市、智能机器承担物质生产的未来世界里，统治者群体与中产者群体却依然保持着人类的原初生物学形态，既未出现经过技术改造的“后人类”身体景观，也缺乏脑机接口等增强现实设备的细节勾勒。这种科技发展的“偏科”现象，引发了不少“硬核科幻”爱好者的“违和感”。

更进一步说，当郝景芳主动搁置了赛博格技术、基因编辑技术、生物改造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性进展所提供的科幻叙事元素，她也就搁置了这些元素所带来的物种分化可能。如果将相关的科技元素纳入科幻设定，小说中的经济阶层对立完全可能升级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鸿沟：当特权阶层通过机械义肢、神经芯片实现认知增强，而底层劳工仍依赖肉体从事垃圾处理，这种“后人类”与“纯人类”的生理差异，将使阶层固化获得几乎不可逆的生物基础。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就曾在其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中，将经济学意义上的阶层对立具象化地“转译”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物种对立。赫胥黎笔下的“新世界”通过基因筛选与后天控制，将阶级不平等编码进基因序列，构建了比“垂直都市”更具控制力的“后工业种姓制”：由系统化的社会建制借助基因工程统一执行的“条件设置”与“命运预定”，使得“低等种姓”的智力发育在其胚胎期和婴幼儿期就遭到严重的抑制；流水线式的“睡眠教育”与“条件反射刺激”，又将统治阶级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深深地刻写进每个人的潜意识当中；关闭博物馆、查禁书籍的举措，排除了文化霸权争夺战的另类可能；而泛娱乐化的文化工业和名为“唆麻”的高效致幻剂，则在满足马尔库塞意义上的“虚假需求”的同时，令反抗意识的萌发希望化为乌有。相比起《北京折叠》的时空隔离，这种以生命科学/生命权力的方式完成阶级区隔的“反乌托邦”，无疑是一种阶层固化更加深刻、不平等状况更为极端的社会想象。

相较于赫胥黎的反乌托邦书写，郝景芳选择了一种相对克制的叙事策略，拒绝将人类命运推向物种分化的悬崖。可以说，郝景芳的确提供了一则关于不平等问题喻世明言，但当这位悲天悯人的作者将“后人类”元素搁置的时候，她也给这则本可能更为残酷的社会寓言涂抹上了一层人道主义的温情光晕：即便在极度严苛的阶层隔离中，不同空间的居民依然共享着相同的生物属性、共通的情感结构、可相互理解的存在困境；劳动者的情感联结、道德抉择与生存智慧，似乎始终保留着穿透折叠的某种可能。诚然，《北京折叠》的未来图景不可谓不幽暗，但其叙述仍然称得上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其聚焦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类社会的制度褶皱，而非技术异化的物种断层，这让它牺牲了部分科幻美学的先锋性，却也保留了一份真切的现实指向，在科幻叙事的表征下演奏出一曲关于人类尊严的现代性挽歌。

与此同时，《北京折叠》作为一部描绘未来都市的科幻小说，其在城市环境和都市生活方面的细节描写，却鲜见数字科技或者说“赛博朋克”的元素。这使得其对当代阶级结构的寓言化呈现，尽管关联着智能机器时代的失业危机，却又疏离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的社会症候。随着数码科技与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相互嵌入，时间和空间的阶层分化正在经历着深刻的重塑，但是，“数智时代”的剥削和分化机制，似乎并未采取简洁明晰的空间区隔，而是通过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规训与数据剥削悄然实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蓝领”群体，借助移动互联网实现全城流动，却在算法调度下沦为“数字游牧劳工”；而“996”工作制下的“新白领”，则在KPI考核与流量竞争的“内卷”中陷入“时间贫困”，其昼夜不分的劳动时间被转化为平台资本的增值燃料。这种建立在数据监控与绩效主义之上的剥削机制，比科幻小说中的时空折叠更具隐蔽性：它以“自由接单”“弹性工作”的数字幻象掩盖资本对劳动时间的无界侵占，又以“奋斗文化”的意识形态包装化解劳动者的抗争驱力。

赛博空间的群体区隔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在“KPI绩效主义”主导的信息生产中，普罗大众的时间投注与注意力耗散持续不断地被转化成互联网公司看重的流量与热度，而阶层分化催生的不满情绪则常被引向性别、种族等身份政治议题，因此这种网络社会的群体区隔并非显影、反而遮蔽了阶级维度的事实。2015年至2016年“雨果奖”评选中喧嚣一时的“小狗运动”便是典型案例——“悲伤小狗”（Sad Puppies）和“疯狂小狗”（Rabid Puppies）这两个致力于通过“网络刷票”活动将女性、同性恋、非白种人剔除出“雨果奖”名单的网络组织，以“净化雨果奖”“维护科幻纯粹性”为名，行排斥多元身份之实，将选票政治异化为极右翼文化霸权的角力场。这种建立在身份差异之上的赛博区隔，与隐蔽而高效的数字劳动剥削形成共谋：当公众注意力被性别对立、文化认同等议题捕获，资本对劳工的系统性压榨便得以在“政治（不）正确”的话语混战中悄然延续。

4. 人工智能的崛起与人类劳动的重构：超越寓言的现实主义叩问

在《北京折叠》发表十余年后的今天，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推动着智能机器从工具理性的执行者向认知能力的模仿者跃迁。机器学习的深度训练使算法能够自主生成文本、图像乃至复杂决策，计算机视觉技术让机器具备了媲美人类的环境感知能力，而自然语言处理的突破则实现了人机交互的无缝衔接。这些技术进步不仅重塑了“智能机器”的传统定义，更对人类劳动的存在形态发起了根本性挑战——当算法能够完成法律文书撰写、医疗影像诊断甚至创意内容生产，当机器人在精密制造领域的误差率降至人类难以企及的水准，传统意义上“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二分法，正如莫里兹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所批判的，已无法捕捉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劳动的流动性与复合性[8]。

智能机器对生产领域的深度渗透，正在引发劳动力市场的“创造性破坏”，它不仅导致结构性失业的显性危机，还催生了“零工经济”下的新型剥削——劳动者在算法监控下陷入“数字泰勒主义”[9]的牢笼，看似灵活的工作形态实则掩盖着社会保障的缺失与职业发展的困境。面对这场新技术革命的全面冲击，社会系统的适应性调整显得尤为滞后。一方面，教育体系尚未真正地建立与智能机器时代相匹配的人才培养机制，传统专业设置与新兴技术岗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工业时代的设计框架内，难以有效地应对劳动力市场的碎片化与不稳定性。

当郝景芳在她的小说中运用时空折叠隐喻阶层断裂时，她或许也未曾足够充分地预料到人工智能技术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重构劳动的形态。如今，智能机器对肉体凡胎的取代，已不再是科幻作家笔下的图景，而是

正在改写文明轨迹的现实。在这个机器崛起与人类重构交叠并存的时代，《北京折叠》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是否提供了精妙而自洽的科幻设定体系，而在于唤起我们对现实世界“隐形折叠”的警觉。它提醒我们：技术革命从来不是中性的自然过程，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关系的实践过程。因此，唯有在文本内外同时展开对于技术伦理与制度正义的双重追问，才能让科幻文学的预警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动能。当我们沿着《北京折叠》的问题意识，追问“如何应对新型失业潮”时，我们本质上也是在追问：在智能机器主导的生产体系中，人类将以何种方式重新定义自身的存在价值？社会又该如何在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科幻叙事的未来走向，更关乎我们的文明能否在技术浪潮中抵达平等与正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非物质劳动理论视域下的当代文艺接受研究”（21YJCZH080）

参考文献

- [1] 陈楸帆. 对“科幻现实主义”的再思考 [J]. 名作欣赏, 2013(28): 38-39.
- [2] 任冬梅. 从科幻现实主义角度解读《北京折叠》[J]. 南方文坛, 2016(6): 46-49.
- [3] 施畅. 隔离与混杂：西方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空间 [J]. 中国文艺评论, 2018(4): 113.
- [4] 林品. 中国故事·硬科幻·元年——《流浪地球》热潮中的三大迷思 [J]. 电影评介, 2019(9): 38.
- [5] N.维纳. 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M]. 郝季仁译. 新华出版社, 1997: 846.
- [6] 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 [M]. 黄勇、薛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1-9.
- [7] 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 [M]. 巴曙松, 等, 译. 中信出版社, 2014.
- [8] 莫里兹奥·拉扎拉托. 非物质劳动 [C]. 霍炬译, 张历君校. 见许纪霖主编、罗岗执行主编. 帝国、都市与现代性.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39.
- [9] 莫里茨·奥滕立德. 数字工厂 [M]. 黄瑶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